

## 喬姆斯基最新談話：歷史是曲折的

---

2015-09-29 品言書館



在諾姆·喬姆斯基【1】聲名赫赫的職業生涯中，他首要關注的問題之一是：不斷質疑（且敦促我們也去質疑）統禦社會的各種臆斷與規範。

九月十九日喬姆斯基在紐約市的新學院【2】發表了關於權力、意識形態與美國外交政策的演講之後，義大利自由撰稿人湯瑪斯·塞甘蒂尼和這位八十六歲的老人坐下來討論了他演講的某些主題，以及這些主題與社會變革過程的關係。對於激進人士來說，要爭取進步，就需要戳破那個不可避免性的泡泡：比如，經濟緊縮“是一個設計者為自身的目的而做出的政策決定”。喬姆斯基說，執行經濟緊縮政策不是“因為什麼經濟規律”。美國的資本主義也得益於意識形態的混亂：

儘管其與自由市場為伍，卻充斥著對其中某些最強大的私人經濟行為者的補貼。這個泡泡也需要被捅破。

除了討論激進社會變革的前景之外，喬姆斯基還評論了歐元區的危機、激進左翼聯盟【3】是否能避免向希臘的債主們屈服、傑瑞米·科爾賓【4】和伯尼·桑德斯【5】的意義。

喬姆斯基依然保持著清醒的樂觀：“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看到：社會向更加公正的方向發展是一個總體的趨勢，當然也存在倒退與反復。”

以下是訪談正文：

湯瑪斯·塞甘蒂尼：幾年前在一次訪談中您說到：佔領華爾街運動【6】在美國創造出一種罕有的團結感。九月十七日是佔領華爾街運動四周年。您對過去二十年來類似佔領華爾街運動這樣的社會運動有何評價？這些運動在促進社會變革上是否有效？這些運動要怎樣才能更有效？

諾姆·喬姆斯基：這些運動都對社會產生了影響，雖然它們沒能演變成持續進行的運動。我們的社會是非常原子化的；少有那種具有機構性記憶的有延續性的組織、那種知道如何把運動深化進階的組織。

部分地是由於勞工運動遭到了破壞；勞工運動曾經為許多社會活動提供了一個穩固的基礎。時至今日，事實上唯一有延續性的機構是教堂。許多活動是以教堂為基礎進行的。

運動要能夠持續是一件困難的事兒。出現過許多年輕人搞的運動，往往曇花一現；但是從另一方面看，也有累計的效果。你永遠無法知道：什麼時候某件事會引發一個大運動。運動一次又一次發生：民權運動、女權運動。因此我們要堅持嘗試，直到某個大運動能夠形成。

湯瑪斯·塞甘蒂尼：2008年經濟危機清楚地表明瞭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說的缺陷。儘管如此，新自由主義依然存在，其原則依然被許多國家採納。為什麼在2008年經濟危機的悲劇性後果之後，新自由主義學說看來依然如此有韌性？為何迄今還沒有任何強烈的反彈，像大蕭條【7】之後出現的那種？

諾姆·喬姆斯基：首先，本次危機之後歐洲的反應比美國的要糟糕得多，這一點相當讓人驚訝。在美國，有些許刺激經濟增長的努力，量化寬鬆政策【8】，等等；從而逐漸讓經濟復蘇。

事實上，對許多國家來說，從大蕭條中復蘇比從2008年經濟危機中復蘇要來得快；原因有多方面。在歐洲，經濟復蘇緩慢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就像許多人都指出的，單一貨幣機制是一個註定的災難。在歐盟內部，應對危機的機制不可用：比如，希臘就不能貶低其貨幣。

歐洲一體化在某些方面有積極的作用，但在有些方面卻有消極的作用；特別是當歐盟被極端反動的經濟強權所控制，這些經濟強權把毀滅性的經濟政策強加到其他國家之上，這種經濟政策根本上就是一種形式的階級戰爭。

為什麼沒有反彈？嗯，弱國沒有得到他國的支持。假如希臘有西班牙、葡萄牙、義大利及其它國家的支援，他們也許能夠抵抗歐盟官員的強力。這是有點特殊的情況，和當代社會的發展有關。還記得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對經濟危機的反彈不是那麼吸引人：其中的一種就是納粹主義。

湯瑪斯·塞甘蒂尼：幾個月前，激進左翼聯盟的領導人阿列克西斯·齊普拉斯當選希臘總理。但是最終，他在金融強國的壓力之下不得不做出許多妥協，被迫實行了嚴苛的經濟緊縮政策。

在您看來，總體上來說，當像齊普拉斯這樣的激進左翼領導人掌權後，真正的社會變革會出現嗎？或者，民族國家已經失去太多的主權，並且它們過於依賴金融機構以至於如果它們不遵從自由市場的規則就會被懲戒？

諾姆·喬姆斯基：我說過，在希臘問題上，假如希臘得到歐洲其它國家的廣泛支持的話，它也許能夠頂住歐盟官員與銀行家的聯手攻擊。然而希臘是孤立的：它沒有太多選擇。

有一些很棒的經濟學家，像約瑟夫·斯蒂格利茨【9】就認為：希臘應該乾脆退出歐元區。這是非常險的一招。希臘的經濟規模很小，算不上出口型經濟；它太弱，會頂不住外界的壓力。

有人批評激進左翼聯盟的策略和立場，但是我覺得：在缺乏外界支援的情況下，他們很難有什麼選擇。

湯瑪斯·塞甘蒂尼：我們想像一下，比如說伯尼·桑德斯贏得 2016 年美國總統的選戰。您認為會發生什麼情況？他能夠給資本主義制度的權力結構帶來激進的變革嗎？

諾姆·喬姆斯基：在一個金錢決定的選舉體制下桑德斯成為美國總統的可能性相當小。但是假設他贏了，他會很孤立：他沒有國會議員的支持，沒有各州州長的支持，沒有官僚機構的支持，沒有各州議員的支持；在這樣的體制中孤身一人，他幹不了什麼事兒。一個真正的政治出路應該是全面的變革，而不只是白宮裡的一個人物。

真正的政治出路必須是廣泛的政治運動。事實上，我認為桑德斯競選是有價值的：它提出了一些問題，或許迫使主流的民主黨人士朝進步的方向上走了幾步，

並且它動員了許多群眾的力量；如果這些群眾的力量在選舉之後依然能夠保持活躍的話，那將會是桑德斯競選最積極的成果。

只是沖著四年一度的選舉盛會去的，選舉結束就回家；那將會是一個嚴重的錯誤。社會變革不是那樣發生的。對群眾的動員可能導致有延續性的民眾組織的產生；而這樣的民眾組織或許在長期而言能夠起到作用。

湯瑪斯·塞甘蒂尼：您對於當前湧現出來的人物諸如英國的傑瑞米·科爾賓、西班牙的巴勃羅·伊格萊西亞斯【10】、美國的伯尼·桑德斯有何看法？新左派運動在崛起嗎？或者這些不過是對經濟危機的零星的反應？

諾姆·喬姆斯基：這取決於大眾的反應是什麼。以英國的科爾賓為例：他遭到猛烈的抨擊，不僅有來自保守黨政客的攻擊，甚至還有來自工党政客的攻擊。我希望科爾賓能夠頂住那些對他的攻擊；那要取決於大眾的支持。假如公眾在誹謗與破壞性策略面前依然願意支持他的話，就會產生影響。這一點，對於西班牙的我們能【11】也是一樣。

湯瑪斯·塞甘蒂尼：如何能夠在這麼複雜的問題上動員大量的人力呢？

諾姆·喬姆斯基：問題沒那麼複雜。組織者和活動家的任務是幫助民眾理解，以及促使他們認識到：他們是有力量的；他們不是毫無影響力的。人們覺得無能為力，這一點必須被克服。那就是組織和行動的真諦。

（組織和行動）有的時候成功，有的時候失敗，但是沒有什麼秘密。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一向如此。並且有過成功的先例。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看到：社會向更加公正的方向發展是一個總體的趨勢，當然也存在倒退與反復。

湯瑪斯·塞甘蒂尼：那麼您是否認為：在您的有生之年，人類在建設一個多多少少更加公正的社會上取得了進步？

諾姆·喬姆斯基：社會有了巨大的變遷。只要看看麻省理工學院這裡。在教學樓裡走一趟，看看學生主體的性質吧：大約一半是女性、三分之一是少數族裔、非正式的穿著、人與人之間鬆散的關係，等等。當我 1955 年來到這裡的時候，在同一座教學樓走一遭，你看到的會是白人男子、西裝領帶、極為禮貌、順從，不會問你任何問題的學生群體。這是巨大的變化。

並且這種變化不僅僅發生在這兒；而是到處都是。沒有這些變化的話，你和我不會像今天這樣；事實上你也許根本就不會在這兒。一些文化和社會上的變遷要感謝堅定和專注的行動主義。

另有些事情沒有發生變化，比如勞工運動。在整個美國歷史上，特別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美國勞工運動一直遭受著猛烈的攻擊。美國的勞工運動已經被嚴重削弱了：在私營企業，勞工運動微不足道；現在在公共部門勞工運動也遭到了攻擊。這是一種倒退。

新自由主義政策毫無疑問是一種倒退。對於美國絕大多數人來說，上一代人在社會地位上基本上處於停滯不前或下降的狀態。不是因為什麼經濟規律；而是人為的政策。正如對歐洲而言，經濟緊縮政策不是什麼經濟上的必然一樣；事實上，是經濟扯淡。經濟緊縮政策只不過是一個設計者為自身的目的而做出的政策決定。我認為這一政策基本上是一種階級戰爭；我們可以抵抗這一政策，但是不容易。歷史是曲折的。

湯瑪斯·塞甘蒂尼：您對於資本主義制度會延續下去的觀點有何看法？考慮到該制度依賴於化石燃料、對於環境的有害影響之大。

諾姆·喬姆斯基：被稱作資本主義制度的東西和資本主義或市場經濟的任何一種模式都相距甚遠。以化石燃料工業為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近有一份研究試圖

估計能源公司從政府那裡得到的補貼金額。總額相當大。我記得每年有大約 5 萬億美元。這與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毫無關係。

對於所謂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其它成分來說，也是一樣。迄今為止，在美國及其它西方國家，經濟的金融化比重在新自由主義時期急劇上升。在 2008 年經濟崩潰前夕，美國企業利潤的百分之四十由金融機構掌握著；金融機構對經濟崩潰有大比重的責任。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另有一個研究是在調查美國銀行的利潤問題。這個研究發現：美國銀行的利潤幾乎全部是依靠隱性的政府補貼。有某種擔保；不是白紙黑字的擔保，但是是隱性的擔保。那意思是：假如銀行陷入困境，政府會出手幫助。那就叫做“大到不能倒 ”【12】。

而那些信用評級機構當然知道這一點，他們把這一點也考慮進去了；而高信用等級的金融機構能夠獲得更便宜的貸款；加上如果出問題了它們會得到政府補貼以及其它許多獎勵，這實際上可能等於它們的利潤總額。商業新聞界嘗試著估計這個數額，得到的推測是：每年八百億美元。這和資本主義毫無關係。

經濟的許多其它部門裡的情況也是如此。所以真正的問題是：實質上是國家資本主義的這一制度能否在持續使用化石燃料的過程中延續下去？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毫無疑問地是：不可能。

到目前為止，科學家們有一個非常強烈的共識：如果人類要避免氣溫上升導致的致命後果的話，餘下的化石燃料的絕大部分，或者說大約百分之八十必須留在地下。但是這一點並沒有付諸行動。人類或許在毀滅他們能夠體面生存的機會。氣候災難不會殺死所有人，但是將極大地改變這個世界。

【譯注】

1. 諾姆·喬姆斯基 (Noam Chomsky, 全名 Avram Noam Chomsky, 1928 年生) 是美國哲學家、語言學家、認知學家、邏輯學家、政治評論家、社會公正活動家、無政府工團主義倡議人。喬姆斯基是麻省理工學院語言學的榮譽退休教授，美國當代最重要的知識份子之一。
2. 新學院 (The New School) 是一所位於紐約市的美國高等教育機構，其校舍大部分位於格林威治村一帶，是世界著名的左派大學。
3. 激進左翼聯盟 (Syriza)，是希臘的一個左翼政黨。
4. 傑瑞米·科爾賓 (Jeremy Corbyn, 全名 Jeremy Bernard Corbyn, 1949 年生) 是英國工黨的一名政客。2015 年 9 月 12 日，科爾賓以壓倒性的勝利獲選為工黨領袖。
5. 伯尼·桑德斯 (Bernie Sanders, 或 Bernard "Bernie" Sanders, 1941 年生) 是美國一政客，2015 年 4 月宣佈以民主黨人身份參與角逐 2016 年美國總統選舉。
6. 佔領華爾街運動 (Occupy Wall Street) 是 2011 年 9 月 17 日在紐約市華爾街的祖科蒂公園爆發的對世界範圍的社會和經濟不平等的民眾抗議活動。
7. 大蕭條 (Great Depression) 是指 1929 年至 1933 年之間全球性的經濟大衰退。
8. 量化寬鬆 (Quantitative easing) 是一種非常規的貨幣政策，其操作是由一國的貨幣管理機構 (通常是中央銀行) 通過公開市場操作，以提高實體經濟環境中的貨幣供應量；相當於間接增印鈔票。
9.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 (Joseph Stiglitz, 1943 年生) 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經濟學家，2001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10. 巴勃羅·伊格萊西亞斯（Pablo Iglesias，全名 Pablo Manuel Iglesias

Turrión，生於 1978 年）是西班牙左翼政客。

11. 我們能(Podemos)是西班牙左翼政黨，由巴勃羅·伊格萊西亞斯成立於 2014 年，目前是西班牙第二大黨。

12. 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il）是一個經濟學上的假設；該假設認為一些規模極大或在產業中具有關鍵性地位的企業瀕臨破產時，政府不能等閒視之，甚至要不惜一切相救，以避免企業倒閉後的連鎖反應對社會造成更嚴重的傷害，這種情況即稱為“大到不能倒”。

譯者：公子重牙原文作者：Noam Chomsky